

高嵩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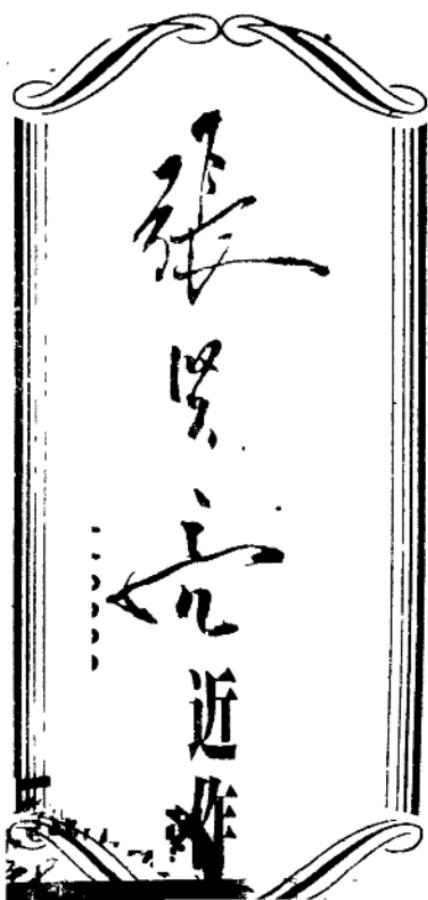
无法苏醒

我的菩提树

我为什么不买日本货

近作

珠海出版社



珠海出版社

(粤)新登字 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贤亮近作/高嵩编

ISBN 7-80607-127-X

I . 张…

II . 高…

III . 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247.5

张贤亮近作

◎高嵩编

终 审: 成 平

责任编辑: 潘自强

装帧设计: 吕唯唯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电 话: 3331403 邮政编码: 519015

封面彩印: 南昌市印刷二厂

印 刷: 江西省邮电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MM 1/32

印 张: 11 字数: 250 千字

版 次: 1995 年 12 月第一版

1995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ISBN7-80607-127-X/I · 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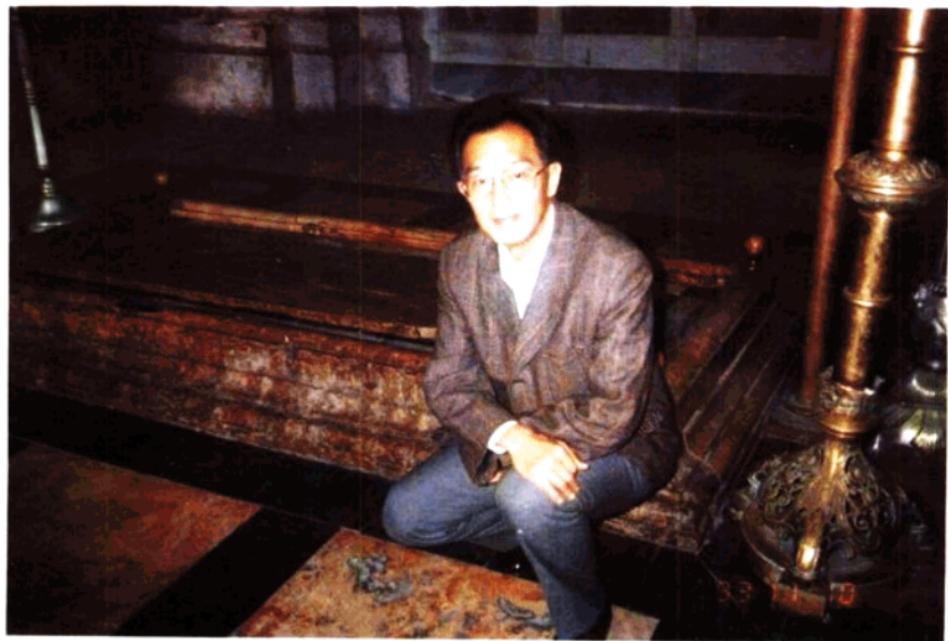
定 价: 16.00 元(平装) 21.00 元(精装)

►作者摄于 1958 年 5 月被劳改前几天，此日记（见《我的菩提树》）为照这张相片后两年在劳改队中所写。



◀摄于 1969 年第二次劳改释放后，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关进监狱前。





作者摄于 1993 年 11 月，在耶路撒冷的各各他(Golgotha——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之地)。背后的石板是耶稣被信徒从十字架上放下后洗涤圣体的石板。

好好做人

——《张贤亮近作》序

写文章并没有什么诀窍，是什么样的人就会写出什么样的文章；作品不过是作者人格的外化。蒙罗兰说“性格就是命运”，其实也可以说“性格就是文章”，于是，~~文章就表现了作者的~~命运。我“下海”以后，许多关心我的朋友和读者曾担心我从此会中断写作，维熙还专门就此在《文汇报》上召唤我“魂兮归来”，但如果仔细看过我过去所有的作品，就会发现我是一个积极关注和投入社会活动的人，就会发现我把写小说不过当做是关注和投入社会的一种活动方式，倘若有机会，我肯定会采取写作外的另一种方式。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上帝或自然在造人的时候，也就是说人在母胎中的时候，并没有决定这人将来的职业，因而每一个人天生下来都是全能的”，如有可能，我会挖掘上帝或自然赋予我的一切潜能。所以，“下海”就是我的必然，是我的命中注定。

我想大约也正是我有这样的性格，才能熬过长达二十二年的劳动改造，才能入死出生，才能代表死者告诉世人我们曾经过一段那么黑暗的时期，从而对现在的“活”应倍加珍惜。“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生命对每一个人都只有一次，佛经中说人获得人身之

难，如“盲龟之遇浮木”，用现在人们熟悉的话来说是：每一个都是“珍稀动物”！任何人，不管他在历史上多么重要，有多么了不起的成就，都无权残害其他任何一个人，漠视其他人的生命和让其他人为他献出生命。我认为我有权代表死者写出：

《我的菩提树》！

譬如，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在我们回顾那段令人痛心切齿的历史的时候，很多人都写了非常好、非常动人的纪念文章，而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却偏偏不满足仅仅“以史为鉴”，一定要现在就有所作为不可，于是产生了：

《我为什么不买日本货》！

拒绝，也是一种行动！

说到“下海”，我想，我会比坐在书房里完成单纯的写作计划的作家能更深切地体会到，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历史任务面前，在各方面都准备不足。我们在肉体上跨入了新时期，但肉体内仍笼罩着旧时期的阴影。如果说关键的问题是“换脑筋”的话，那么恰恰是“脑筋”还没有完全转“换”，归结起来可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上层建筑严重地制约了经济基础。这就产生了：

《无法苏醒》！

我想用这部“近作”来回报关心我的友人和读者。所谓“近作”，正是我“下海”以后写作的，除了收入这部书的一部长篇、一部中篇和一篇文章外，这期间还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部散文集《边缘小品》。作为一个业余作者，两年多出版了这些作品，我想在数量上至少还能算及格，即使是用单纯的任务观点来衡量，我也完成了一个“专业作家”的任务了吧。

我还会利用业余时间继续写下去，我很赞同王蒙这样的看法，“写作基本上应该是业余的事”。

那么，又什么是“业”呢？

我以为，只有好好做“人”，才应该是正业的吧！

最后，这部“近作”能在很短时间跟读者见面，我应该感谢高嵩先生和潘自强先生！

张贤亮

1995年11月13日



作 者 像

目 录

我的菩提树 (长篇小说)

上 部	(1)
下 部	(133)
告地状	(280)

无法苏醒 (中篇小说)

无法苏醒	(285)
------------	-------

我为什么不买日本货 (散文)

我为什么不买日本货	(329)
我应该有所表示!	(338)

公元一九六〇年

7月11日 基建运土坯。

注释：

我不知道为什么从这天开始记日记。这一天，在“改造”我的农场里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从我1958年5月18日投入这个劳改农场以来，到今天已经过了七百多天。我已经完全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好像我一生下来从小到大都过着这样的生活似的。锋利的刀已将我拦腰斩断，又把我有意识的这一部分抛到荒郊野外。我不知道我的另一部分在哪里和我是不是曾经完整过。当狠狠地砸在地上时，惟独疼痛的感觉是真实的，但疼痛了七百多天后人就麻木了，我不再感到疼痛而只感到饥饿。

如果没有这本薄薄的日记本，我就会怀疑那一段生活是否真实。人，其实是健忘的。不管是快乐或者痛苦，人总是面对此时此刻。但世界和人的现在是过去的结果，未来的世界和人又是现在的结果；历史和人的生命都不会白白地、毫无痕迹地消失。

然而，现在有许多人仍然不仅不敢面对现实，而且不敢面对过去，我就觉得应该将这本真实的日记公之于世，并且要详加注释了。

且说这天晚上我翻开刚刚从小卖部买来的日记本，想在上面写点什么的时候，我最感兴趣的不过是我手中的这支钢笔。为什么要记日记，也许就是因为我还拥有这支钢笔。钢笔这类东西，在劳改农场是换不出去的。即使是一小撮旱烟，一小块饼子，也没有人愿意拿出来换它。在劳改农场，一样东西的交换价值完全要看它是否有助于生存，与生存毫无关系的东西便毫无价值。除了钢笔，其余多少有利于生存的东西，我已经换了食物吃掉了。这时对我来说，能够保存一具纯粹生理意义上的“活”的躯体，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人不怕冷，像猴子一样光着身子也能“活”，我会把裤衩都脱下来换了吃掉。

这是支外国名牌钢笔，在一堆破破烂烂的东西中闪闪发光。我握着它，它仿佛本身就有温度。这温度暖人心肺。它提醒我，我还曾经生活在另外一种世界。有时，那个世界也会在我脑海中出现，但是显现得极为虚无缥缈，并且徒然引起我莫名的忧郁。而钢笔却指点我还能利用在那个世界中获得的一种技能在这个世界做些什么。在一切求生的办法都用尽了之后，它就对我发出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引诱。

这支闪亮的钢笔与周围的现实是那么不协调，但它却是我与另一个世界的唯一的物质联系。它闪亮的光也许是我的一线希望？

这本日记是我利用钢笔作为一种求生的手段的空隙中间记的。而记日记的时候我首先想的并不是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和我今天有什么想法值得记下来，却是我在日记本上千万不能记下哪些事和哪些想法。我们当时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不允许任何人有个人隐私。任何人的任何隐私都要向党“交代”出来，包括个人的日记在内。领导根据人们交代出来的隐私的隐密程度，来测定每个人对党忠诚的程度。领导认为只有那些把最不可告人的隐私都交代出来的人才是最忠诚的。有的人为了表示自己极端忠诚，绝

对忠诚，甚至虚构出许多自己原来并没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而恰恰是这样一些人最终受到处罚，被投入劳动改造。在众多的“思想犯”中，因为主动交出的日记上有某些字句被领导发现有问题的人，占很大比例。

于是，经验使人们学会了虚伪。随着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不断地卷入更多的人，这种经验便普遍化了，以至虚伪几乎成了中国人的共同习惯。这种习惯不仅贯穿在人们日常生活中，而且影响了当时和后来整个中国的道德文化和文学艺术。

书写出的文字既然会使自己的“反动思想”暴露，当然也能用来粉饰自己。经验又教会了人们怎样利用各种各样的书面文字向领导或他人婉转地传递某种有利于自己的信息，这是虚伪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日记，则可成为不是为自己而写却是为向别人宣传自己而写的宣传品。在六十年代的中国，人们经常可以看到烈士们和活着的英雄们的日记，这些日记中充满着他们的“崇高精神”和“先进思想”，而被领导指定为人们必读的学习材料。从表面上看，写日记的人似乎是独自一人面对自己的心灵坦率地记录个人的心迹，实际上却是早就准备着向读者娓娓而谈。

我并不想成为烈士或英雄，但也不想因为日记而受到更大的磨难。我只是为了写而写。既然要写，则既要处处防备这本日记将会落入他人之手，又要预先想到一旦落入他人之手后自己怎样解释。如何为它“负责”。这样，这本日记当然只能记得像一本流水帐。后来，果不出我所料，这本日记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就被我就业的农场的领导人所没收。他们仔细地检查后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这本日记并没有成为当时处罚我的又一个证据，才让我和我的日记一起留在这个世界上。

现在，这本像流水帐一样的日记的确增加了我注释的难度。北魏时代的郦道元注《水经》，花了多年时间跋山涉水，探微究疑，

考异辨难，最后才写成了著名的《水经注》。但在记忆中扒掘并不比考证大量的典籍容易。那一段生活又如梦、如雾一般地模糊。我要忠实地再现当时的现实，不但需要心灵和此时此刻的现实分离，以便使自己完全沉浸在往事里，而且要再一次地受到往事的折磨。在注释一份历史文件时居然在心、身两方面都会受到摧残，是任何注释家不会遇到的。然而我仍然庆幸我那时没有把日记记得更为详细些。因为，如果我在这本日记里再多吐露一个字，我现在便不会安然地在这里注释它，这本日记也就归入了死刑犯的档案而被销毁了。

事实上，1970年这本日记被没收后，检查者已经在上面划下了质疑的记号，只是不知道当时为什么没有质问我。划记号的地方，我也如实标出。不过仅有两处，可见得我这本日记写得多么“干净”。

1980年，我平反后，这本日记和其它档案一起退还给我。其它档案——表格、自我检查、别人对我的检举揭发等等——按政策规定当着我的面销毁了，我只要求把它交还给我保存。今天，又只剩下它成了我与另一个世界的惟一联系。难道我过的那段生活，我付出了生命中最可贵的青春只得出这样一个结果？已经发黄的纸张褪色的笔迹，一一牵动出往事。往事如许，使我不相信那的确是我一段生活。我不想评论那段历史，也不准备用现在能够获得的资料来丰富我的注释。我只想让它原原本本地告诉人们世界和人会降到多么低下的水平，在那样低下的物质水平和精神水平中人以什么样的状态生存着。

再来说这一天，1960年的7月11日。“基建”，就是盖房子。我们都不知道在肚子都吃不饱的时候，在犯人接二连三死亡的时候为什么劳改农场要这么起劲地盖房子。七月，在西北地区是个

农事比较闲散的季节：秋作物正在生长，夏作物已经收割。若干年前，农民们总是利用这个时候休养生息，在柳荫下，在小河边，把自己疲劳的身躯安放在生育他们的土地上。过去的骚人墨客从这种画面中看到农民的悠闲和自得，而在失意和受到挫折的时候吟出“归去来兮”的诗篇；农村似乎永远是中国人向往的乐园。可是自农村实行公社化后，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农民们再也没有一天轻松的日子，我们劳改农场的犯人更不用提了。体力劳动既然是改造人思想的惟一有效手段，那就要像病人服药一样，一天也不能中断。

然而这年的七月真是一个天气非常好的月份。太阳并没有因为饥荒变轻变薄，她依然厚实而丰满。我现在又梦到那没有污染的蓝天，那舒卷自如的白云。是的，我们现在很难见到那种没有污染的天空了。在基建工地上，就是在那准备盖房子的一片台地上，可以看到青葱的水稻散发着墨绿色的如缎子般的光泽。不时有燠热的、裹带着庄稼的馨香的风吹来，使疲惫的劳动号子也显得不那么疲惫了。

哥儿们抬起夯啊！哎哎哟啊！
使劲往下夯啊！哎哎哟啊！
不使劲的是王八哟！哎哎哟啊！
大家日他娘啊！哎哎哟啊！……

好天气，好月份，会减少人的忧伤和饥饿感，这大概也是我为什么在这个月开始记日记的一个原因。

因为气候好，于是领导上向我们宣布的“由于自然灾害使得农业连年减产，所以要实行‘低标准瓜菜代’”这种说法总不能令人信服。但怀疑尽管怀疑，也不会有一个人去向领导要求解释。大

家都做出一副深信不疑的样子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用残余的生命来改造自己。很多年后，我们才知道在那整整的三年中全体中国人为什么都一起陷入饥饿的深渊。所有社会重大事件的真正原因总是向我们宣布得太晚太迟。但这似乎也并没有使我们感到有什么不便，反而会让我们经常有恍然大悟的机会，在回忆那些悲剧时却给予喜剧性的处理。

其实，因为绝大多数劳改犯人原来在各自的单位都像金属部件一样经过了“热处理”，已经获得了适合于劳改的性能，所以来到这个劳改农场几乎都怀着一种幸福感，至少是像瞎子在独木桥上失足却只不过是掉到了既浅且干的河底似的，心情比较踏实了。不管怎么样，总比在“热处理”时被批判斗争好受得多。那时，还以为自己的脚下是万丈深渊呢。所以，还怀疑什么呢？给我们吃多少就多少吧。即使劳改农场不供应伙食，也是领导给我们的恩典。因而，劳动虽然无精打采，劳动号子却既响亮又诙谐。

天气好，活儿也好。所谓盖房子，严格地说来不过是用水把泥土粘合在一起，再搭上几根木头，顶上用芦苇盖住，砌成一个四方形的可以遮风挡雨的空间而已。后来推广了“大庆经验”，这种房子就有了一个东北方言的专用名称，叫“干打垒”。“运土坯”，又是最简单的体力劳动。当砖头用的土坯并不需要烧炼，用铁锹直接从地里挖起来晒干便成，所以每块土坯都呈极不规则的多边形，实际上只能称作土块。一块干土块有七公斤到十公斤重。我每次只能背三块，至多四块。我整个人连皮带肉不过四十四公斤重，三四块土坯已相当于我的全部体重。除了我的皮肉，我还要再背上一倍重量，走五十米到一百米路。

其实，最简单的事情往往就是最繁重的。这大约就是好逸恶劳的人类却要把一切工作都弄得复杂化的一个原因。不规则的多边形物体会在脊背上滚动，每走一步，土坯的每一个棱角都要在

我的脊骨上揉搓若干遍。我说的是真正的骨头，因为我全身上下都没有一点皮下脂肪。有时，我甚至能听见干硬的土块和骨头直接摩擦所发生的咯吱咯吱的响声。那响声颇为尖厉，还有点嘲笑的意味。这时，我的咽喉就涌出一丝糖的甜味。我幸好从未把血吐出来过，只是土坯和骨头之间的那一层薄薄的皮肤透出了血迹——反正也看不见。如果你能忍受得过去，皮肤很快就会长出一层胼胝，即俗称“老茧”的保护性角层——你不能忍受也要忍受，所以总能忍受得过去。

但是，运土坯还是有舒服的时候，这便是走在回来的路上。人从事任何一种繁重的劳动都会得到相应的报偿，譬如，那回来的路正好和去的路长度相等。这常常使我不得不叹服自然规律或是上帝的公允。并且，那又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啊，那是一条干的路，没有水，没有泥泞！光脚板插在尘土里趟着走，不但会感受到黄土地的温暖和干燥，而且会扬起一股股烟尘。把背负的重量卸下，我就会感觉到我是自由的。

日记从7月11日这天开始的，我就不得不返回去说说11日以前我们在水稻田里的劳动，不然读者就不能体会到我此刻的舒服，为什么我说运土坯是件好活儿。

水稻在五月份下种，七月，稻苗已经到“拔节期”了。在这之前，我们早已在水稻田里不知拔了多少遍杂草。宁夏人有句谚语说：“稻薅九，饿死狗。”这句押韵的话意思是在水稻田里拔杂草拔的遍数越多，水稻就长得越好——一方面能将草拔得干净，另方面还能“踩田”，用脚把地底下的腐植质踩翻到地面上来当肥料。只是薅草的遍数多和狗挨饿有什么联系，让人费解。为了遵循这个古老的、表达得并不十分清楚的农业经验，我们就必须从五月到七月一直泡在水里。